

2020年,深圳某大厂女工张小满的母亲从陕南农村到深圳务工,成为这个城市保洁群体中的一员。这是一群用体力劳作填满超长工作时间的外来务工者,他们在深圳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,与污渍、垃圾为伴,支撑起城市文明对整洁细节的无限追求。他们在深圳寻找自己的生存缝隙,有自己的生活圈子,知道如何寻找机会,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。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,却总是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,而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命运本质,其实也映照着我们绝大多数人。张小满在新书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中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,串联起超级城市运转的一个个侧面。

我的母亲做保洁

□张小满

我们遇到的很多体力劳动者,他们的手都很粗糙且关节变形,农民的手,建筑工人的手,环卫工的手,拾荒者的手,绿化工的手……他们为什么不戴手套?答案都和我母亲一样,不戴手套可以让工作做得更快。

母亲一般先清洁女厕所。

隔夜的粪便尿液发酵成黄斑污渍,滋生出霉菌和细菌。把坐垫掀起,用洁厕剂喷淋马桶内壁,刷洗,马桶内缘的污垢需要更加用力旋转刷洗。马桶外侧底座也要刷洗。用黄色干毛巾将溅在马桶边沿的水滴擦干。被母亲用毛巾擦干的马桶,洁白如新,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。

不是所有人都是文明人。母亲会碰到有人大小便后不冲水,排泄完盖上马桶盖就走;会遇到流在马桶边沿的经血,在地板上凝固成一朵鲜红的小刺花;会遇上有人像扯拉面一样一节一节扯断纸巾,垃圾篓里的纸巾和卫生巾散落一地。母亲忍受着臭味收拾,但她没感到恶心。母亲说,这是工作。“一个新马桶刷只能用二十天,就光秃秃的了。要不是为了挣钱,谁去刷马桶?”

接着,母亲开始拖卫生间的地板,腰、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。

打扫男厕所的流程类似。最难处理的是小便池里的尿渍,母亲只能用更多清洁剂,用更大力气擦洗。

上午9点,当写字楼的白领来到工位,开启一天的工作,保洁员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。接下来,他们要保证的便是不要被“投诉”,应付各种突发情况,来回走动,不断擦拭,处理“污染”现场。

打扫男厕所对母亲来说是极其尴尬的,每次她都小心翼翼,把黄色挡板放在门口,但还是会有对提示视而不见的人。有的人看到母亲在打扫卫生,仍会进去站在小便池前就开始解裤子,忽视正在打扫卫生的是一个老年女性。母亲只能在他尚未正式开始之前,撤出洗手间。

一位东北阿姨被租户投诉卫生做得不干净,她气不过,就跟投诉者吵了一架,对方吵不过阿姨,就去找了阿姨的经理。

大经理带着副经理,一个走前面,一个走后面,带着礼品,低着头,上门去给那家公司的领导赔礼道歉,说对不起。母亲是在东北阿姨突然走了之后才知道,她因为

吵架被开除了。母亲既同情被开除的阿姨,也替大经理、副经理感到委屈,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干得不容易。在深圳做保洁员三年,母亲已经懂得如何在工作群里跟领导交涉。

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母亲,从一个把智能手机当砖头,只用来打电话的人,学会了在微信群里上传健康码、行程卡,申报身份信息,学会了把微信工作群当作自己争取权益的工具,遇到困难的事情,她都拍图给领导反馈。

比如有一次,一个面积达四五万平方米的办公室刚清空,地板上全是灰尘。大经理让母亲去打扫,母亲在群里反馈,办公楼里面的清洁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畴。这事不了了之。后来是母亲的副经理上来把这活儿干了。

面对厕所被投诉的问题,最终妥协的还是母亲。敲厕所门无人理睬时,她总是走进去又退出来,等一等,走进去又退出来。无论母亲怎么用语言暗示,反反复复,对方就是不出来,手机一直响。

母亲感叹说,这里面的人,蹲厕所里干什么呢?哪个倒霉的老板请了他们?

我无法回答母亲,为什么年轻人要躲在厕所里,一待就是几十分钟。因为就我的职场体验来说,面对高强度的竞争压力,有时候厕所确实可以让人平静。当一个社畜被老板骂一通,没有比洗手间更好让人平息的地方。真正的职场人,哭完,洗完脸,还是要回到工位继续工作。有些电话和信息只适合在洗手间里回复。母亲无数次听到有人在洗手间里约见面时间,有人跟电话里的人小心介绍自己,似乎是为了换了工作。

即便如此,母亲还是认为,自己接了这份工,就得做好。在这栋写字楼工作期间,她还没有被扣过工资,也认为没有遇到过特别不可理喻的人。因为相比同事张阿姨所遭遇的,母亲遇到的事都只是小巫见大巫。

张阿姨跟母亲一样,负责三个楼层的清洁,也要负责男厕所卫生。这栋楼的男厕所每个单独的隔间里没有垃圾桶,意味着所有脏物都得靠马桶抽水冲下去。一位男士上完厕所后把脏纸巾直接扔在了地板上。张阿姨拦住他,说了一句,不要把纸巾丢在地上。第二天,张阿姨遭到了报复,有人把大便直接排在了厕所地板上。张阿姨跟副经理哭诉,说有人故意害她。但厕所里不会有监控,这件事最后还是以张阿姨自己打扫了污秽作罢。

另一种麻烦情况是碰到抽烟的。

写字楼是明确禁止抽烟的,但总有人偷偷抽,楼梯过道上总是有烟头和烟灰,还有令人恶心的痰。物业不敢提醒租户,就找环境公司的麻烦,环境公司就找该区域经理的麻烦,到经理这一层级,就意味着母亲有麻烦了。

好在母亲是一个敢于表达的人。

她的原则是不吵架,“一吵就瞎,一吵就要作怪,害的还是自己”。一开始,在楼梯道抽烟的人很多,母亲首先想到的方式是给这些抽烟的男人说好话。她叫年龄大一点的男人“师傅”,叫年轻一些的“帅哥”。

她常碰到一个瘦瘦高高、大概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楼梯过道上抽烟,一边抽,一边咳嗽。

见过两三次以后,母亲实在忍不住,走过去用方言跟他对话。

“师傅,你一天能抽一包?”

“抽不了一包。”

“烟瘾还不算大哦。”

母亲停了停又说:“师傅,甲方经理光投诉楼梯过道有烟头,你看,这墙上贴了这么个牌子,吸烟要罚钱。要么你找张餐巾纸垫着,或者用一次性杯子接着,抽完了我给你扔。”

男人听懂了母亲的话,后来很少出现在楼梯过道了。即使见到,母亲也发现,他会主动用塑料袋把烟灰和烟头带走。

因为楼梯过道烟灰、烟头问题总被投诉,母亲的经理对抽烟行为也很厌烦,就带着母亲一起向上反馈。经理不比母亲工资高多少,也照样要干活。面对这样的局面,可能是动了恻隐之心——打工的怜惜打工的。

女卫生间避免了尴尬的问题,母亲做起来更顺心一些。但难处是,洗手台和地板永远是湿的,需要母亲不断去擦拭。地板上,马桶里永远有毛发。母亲先用刮刀把毛发聚拢到一起,再用纸包起来,丢进垃圾桶。“一耙一大团,一耙一大团,多得很!”有一些女孩喜欢把束起来的头发解开,弯腰,低头,把头发从后脑勺甩到脸上,用手抓一番,再伸腰,仰头,把头发扎起来,像完成一种仪式,随之而来的是满地的头发。

垃圾桶里什么都有。有人为了图方便,会在洗手池洗碗,把快餐的饭盒及剩饭剩菜倒进厕所的垃圾桶。泡发的茶叶、果皮,胡乱塞在一起。垃圾袋拎出来的时候,底部流出脏水。

最可怕的是奶茶杯子。母亲处理过垃圾桶里无数奶茶杯子,但没有一杯奶茶是真正喝完的。奶茶从杯子里滴出来,粘到垃圾桶的纸上、塑料上,甚至滴到地毯上,变得湿淋淋,黏糊糊。她用手去把杯子扶正,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,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,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,这样才不至于让废弃的奶茶液弄脏更多地方。

母亲被奶茶气得偷偷哭过好几次,她恨奶茶。从年轻到年老,她没有喝过一杯奶茶。她不理解这东西有啥好喝的,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热衷于它,又如此浪费?

母亲跟我说:“啥人都有,有的人文明,有的一点都不,人跟人的教养有差别,我也理解。我还不是为了要挣一点钱,只能慢慢做,能怎么办?你不知道保洁员受了多少气。”

(本文摘自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,内容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
张小满 著
光启书局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